



异向共建

YIXIANG GONGJIAN

——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于闽梅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异向共建

YIXIANG GONGJIAN

——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于闽梅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向共建: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于闽梅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4

(灯下学术文丛)

ISBN 978-7-80742-575-5

I. 异… II. 于… III. ①梁启超 (1873~1929) - 文学理论 - 研究②王国维 (1877~1927) - 文学理论 - 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8641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23(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异向共建——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作 者 于闽梅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南昌市民营科技园民营大道 69 号

开 本 1/32 880mm×1230mm

印 张 10.3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7-80742-575-5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节 现代性的内涵及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型	(1)
一、现代性的悖论	(1)
二、现代性在中国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	(7)
第二节 考察时间界定(1897—1912)与中心人物	(12)
一、时间界定:从 1897 年到 1912 年	(12)
二、考察对象: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	(20)
第三节 梁启超、王国维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反思	(22)
第一章 两种向度的文学理论的提出	(34)
第一节 梁启超:“牺牲一身觉天下”	(36)
一、1897 年:今文经学下的文学观	(38)
二、1898 年:政治小说的启蒙意义	(44)
三、1902 年:国民性文学理论的提出	(49)
第二节 王国维:“欲语此怀谁与共”	(59)
一、1895 年到 1912 年的时代影响	(59)
二、如何改造民质	(65)
三、以欲望为中心建立新符码的尝试	(68)
第三节 梁启超启蒙主义文学理论的提出	(71)
一、“改造国民之品质”的“诗界革命”:犹抱复“古”半遮面	(72)

二、“小说界革命”：“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	(79)
三、“文界革命”：日本的榜样与中国的靶子	(85)
第四节 王国维审美主义文学理论的提出	(91)
一、“西上中下”的文学视野的置移	(92)
二、中国式的“为艺术而艺术”观的提出	(100)
三、现代悲剧观的引入与深化	(115)
第二章 文学的新动力：梁启超的革命论与王国维的欲望观	(123)
第一节 欲望观三部曲：眩惑——解脱——转化	(123)
一、生活之欲与“眩惑”	(124)
二、“解脱”与“实念”	(131)
三、转化：从生活之欲到势力之欲	(137)
第二节 欲望、革命与文学的关系	(142)
第三章 文学的新功能：梁启超的“觉世”论与王国维的“救治”说	(151)
第一节 从“经世”到“觉世”的质变	(153)
第二节 觉世文论：“文以载”欧西之道	(162)
第三节 “游戏”说：从“消遣”到“慰藉”到“救治”	(168)
第四节 王国维的慰藉、救治观与梁启超的觉世文论之间的联系	(177)
第四章 文学的新标准：梁启超之“欧洲意境”论与王国维的“境界”说	(183)
第一节 “欧洲之意境”	(184)
第二节 “诗人的境界”	(190)
第五章 文学与新人格：梁启超、王国维人格论的异同与 Modernity	(199)
第一节 人格说传统在现代的延伸	(202)
第二节 梁启超的群体人格塑造	(208)

第三节 王国维的个体人格关怀	(215)
第四节 小结	(228)
第六章 极端对立的两极和充满悖论的现代性	(231)
第一节 梁启超、王国维文学理论对立的根源	(231)
第二节 调和:相似的互补性的文论	(237)
一、相似的现代性方法论	(238)
二、相似的俗语文学观念	(242)
三、进化论影响下的文学史观	(248)
四、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反思及对西学的接纳态度	(253)
五、地理观照下的文学观	(258)
第三节 梁启超、王国维文学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260)
一、梁启超文学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260)
二、王国维文学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266)
结 语	(277)
附录一 晚清紧急状态下的政治自由与现代性的产生	(281)
附录二 1927年:王国维的辫子——文化、身体以及矛盾的王国维	(289)
主要参考文献	(306)
后 记	(320)

引 论

第一节 现代性的内涵及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型

一、现代性的悖论

考察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型,就要理解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区别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历史革新与现代转型的质变之间的差异。为此,有必要由“什么是现代性”这个问题入手,先理清思路。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现代性”(la Modernité,modernity)这个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文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成为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从现代性角度考察文学理念的现代转型,首先要问的“宏大”问题就是:什么是现代性?有没有不同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对于中国文论来说,现代性转型与文论史上其他文论范型转变有何不同?文论现代性初步转型是如何完成的?研究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有何意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最终关系到对晚清及民初的总体语境方方面面的再认识,并与我们对今天所处的世界境遇的认识问题相关。

“现代”(Modern),拉丁文为 modo,意指“刚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对现代性的历史内涵和哲学意义究竟该怎么界定,仍然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对“现代性”达成的大致共识是:现代性是指

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历史和文化。特洛尔奇对于启蒙运动的时间定位是被广泛认可的,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基础在17世纪以及更往前的文艺复兴,其繁盛期在18世纪,衰落于19世纪”^①。与此相关,现代性不仅代表一段历史过程,代表着启蒙时代以来人以及社会文化等所有事务全面转变的过程,它还代表了一种不断地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虽然,就狭义而言,现代性是以工业文明为标志,但是它并不局限于技术与科学的进步,而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个文明结构的重新调整和塑造。

因而,现代性其实是一组永恒的问题和答案,^②它永远在向我们发问:“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研究现代性在文学理论中的体现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这些问题和答案如果用现代工业社会的用语来回答,它标志着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一个不完整的境遇、一个片段或部分完成的工程。

那么,作为一种概念和叙事的现代性,是否有一种一致性,使得这种情景化的叙事不发生断裂?如果有,这种一致性是什么?如果没有,又发生了怎样的断裂呢?

众所周知,现代性是与前现代性的决裂,决裂的依据正是启蒙运动所标榜的理性至上、科学万能、平等自由等思想原则与进步进化、功利主义、乐观主义精神。现代性以可控制和规范化为特

^① 美国宗教哲学家路易·迪普雷(Louis Dupre)也认为:现代性产生于中世纪后期神学的各种思潮以及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现代性的种子在14世纪后期就已埋下,指的是人的精神范畴和主体性觉醒。德国思想家特洛尔奇认为现代起源于13、14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以上引文均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75页。

^② 2002年7月31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介绍他即将出版的新著《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分析》时,就现代性作了四个修正:(1)现代性是不能分期的;(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叙事;(3)主体性是不可再现的,而只能进行情景化的叙述;(4)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必须关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转引自陈永国《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0期。

征,为社会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由于启蒙主义的展开和资产阶级占领历史舞台同步,所以这种现代性被有的研究者称为“资产阶级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

迄今为止,现代人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启蒙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构成了一个具有特权的分析领域,成为福柯所谓的一种“敲诈”。随着启蒙主义的推行,人不仅成为现代化的主体,也跟自然一样成为现代化的对象。这种双重身份导致了“巨大的不幸”:“从进步思想的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①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不仅没有出现启蒙理性所期待的乐观场面,反而出现了理性桎梏、物欲膨胀、道德沦丧、发展过度等各种问题,使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等基本关系都发生严重的扭曲和异化,启蒙理性沦落为启蒙工具,工具理性日渐君临于启蒙理性所宣扬的自由之上,成为一种原先启蒙理性所批判的专制工具,甚至成为集权主义的温床。因此我们自身需要对所处的历史时代进行反省和批判,摆脱一切简单化和权威判断的模式。这种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否定性理解,就是通常所谓的“反现代性”,它对于现代的性质、状态的理解与启蒙现代性所理解的恰恰相反。

在哲学上,现代性的源头是康德(1724—1804)。康德哲学是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性的一次深刻总结。他把理性视为自然和道德的立法者,“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利用时,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

①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页。

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①。因而在康德这里,以理性和启蒙为旨归的现代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康德还对现代性的两个基本信念——理性与进步——作出了有保留的限定,为后代哲学家讨论现代性提供了批判的余地。康德哲学中的理性隐含着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裂,这等于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分裂。因此,康德之后的现代性批判分裂为两个传统:一个是黑格尔的理性绝对化,另一个是尼采的非理性的酒神精神。

康德之后现代性在哲学上呈现为上述两种动态结构。一方面是黑格尔将理性绝对化,提出“绝对理念”的哲学,理性获得了空前的和永久的自由。理性是自律的、自思的,是一切目的的目的,也是趋向目的的动力,一切都是理性的外现和展开。这种理性观成为现代性的正题,它与启蒙精神始终联系在一起,并与世俗化过程密切相关,集中地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另一方面,尼采则批判了以理性替代宗教的启蒙哲学思路。在尼采这里,理性不再是无所羁绊和绝对自由的,它不是衡量一切的最终尺度,理性重新被纳入人的生命存在中。尼采指出:只有艺术的超历史力量——而不是理性——才可以填补“上帝已死”之后的真空,应该以艺术填补传统宗教逐渐消逝后的真空。质言之,黑格尔与尼采的哲学恰好构成现代性的正题与反题。

这之后出现了卡林内斯库所总结的现代性内部的“情景化叙事”的断裂:

要确切地说出何时人们可以谈论两种不同的且尖锐冲突的现代性的出现,是不可能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 19

^①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页。

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不可弥合的两种现代性的分裂,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席卷经济和社会领域变革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从那时以来,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敌对,尽管在彼此要竭尽全力战胜对方的过程中并不认可彼此的影响,却也激励相互之间影响。^①

卡林内斯库指出了这种非一致性的要点:(1)从历史的角度看,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现代性的断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性。(2)这种断裂造成了现代性内部的思想文化冲突,以理性、进步为价值诉求的启蒙主义和以审美、自由为诉求的现代主义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立。对启蒙精神的弘扬与怀疑,对启蒙价值观念的肯定与否定,正好构成了现代性的正题与反题。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并存又对抗的情势,说明了现代性存在着鲍曼所谓的非一致性,是包含着相反命题的悖论: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
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就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②

问题是:产生于现代性内部断裂的审美现代性的实质是反现代性,明明是反对启蒙现代性的,而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也是现代性的体现?审美现代性又是如何反抗启蒙现代性的?

^①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ru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1—42.

^②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91, p.10.

现代主义高举审美现代性,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出发来反对启蒙理性的线性时间观,它并不相信笼罩在现代科技文明与进步光环之上的理性的全能:“何以见得这个世纪的疯狂不是源于过度工作、运动、巨大努力和剧烈劳动,源于它的理智力量紧张得几近爆裂,源于每一领域中的过度生产?”^①通过批判与反思,审美现代性表达出对启蒙精神及其价值信条的质疑。但是这种批判与反思的精神仍然是对“现代”的理解,质言之,是对“现代”的否定性理解。可以说,审美现代性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哲学与社会思想层面的反思。这种反思从尼采开始,一直延续到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大师们。在文学艺术领域,现代性反题——审美主义出现的突出标志是艺术自立的提出,“为艺术而艺术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市侩现代性 (the Modernity of the Philistine) 的最初产物”^②。从浪漫主义到唯美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主基调都是反思与批判,这种精神视野就来自审美现代性,甚至可以说审美现代性构成了西方现代作家与现代文学的基本文化立场和精神价值取向。

可见,现代性的悖论呈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动态结构,这种悖论导致了其概念本身的多义化。但是许多研究者忽略了现代性内部的这种张力结构。例如,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侧重于把现代性描绘成一种社会行为制度与模式。他从文化与认识论角度出发,把现代性的特征归纳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③,其实是侧重于现代性的正题研究所致。又如,

① Goncourt Brothers(Edmond and Jules de),《日记》,罗贝尔·里卡特编写注释本,Paris:Fasquelle and Falmmarion,1956,卷6,p.207。

② Matei Calinesce,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ru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

③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

张灏把现代化概念泛化,因而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现代性思想,这是把现代性理解为单一的启蒙现代性。^①又如1996年底,杨春时、宋剑华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则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他们的观点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很大反响,但基本立论其实是把现代性仅仅理解为审美现代性,以非理性的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唯一衡量标准,出发的角度是现代性的反题。

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有的学者又称之为“历史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在我看来,其所指称的意义是相同的。^②正是由于现代性存在着这样一个自我质疑的悖论,所以,现代性表现为一方面要求不断现代化,另一方面则对现代化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文化与审美上的批判。

二、现代性在中国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

马克思在谈到亚洲解体的时候,曾经谈到人们对旧有宗法制社会和平生活的依恋和这种制度在客观上缺乏政治自由的弊端: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

① 张灏认为:“现代化是与道德过程无涉的问题。”“所以,康有为等人都不能被描绘成现代主义者。因此居于他们思想核心的是一种关于人和社会的道德——精神性概念。”(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② Kirk A. Dento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9.

马克思看到了启蒙主义与审美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田园般的古典令人在情感上无限依恋，但是启蒙现代性的自由与理性价值是告别这种田园情怀的最高价值所在，必须以启蒙现代性来解放人；另一方面，启蒙现代性的引爆必然造成古典的田园之美的丧失，造成古典意义上的完整的人的丧失，所以必须依靠审美现代性来弥补“人”之缺失。与那些早发现代性国家不同的是，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要面对传统价值的崩溃，而且还要面对西方那些早发现代性国家在物质上的侵略与精神上的伤害。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中展开现代性，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用的比喻虽然形象但是充满暴力——“用人头做成的盛有甜美醇浆的酒杯”^②，而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则用了一个较为文雅却更让人难受的比喻——“一件华美的爬满虱子的长袍”——来形容中国充满悲剧意义的现代性的展开。而在早发现代性国家，现代性呈现的更多的是其进步与自由的美好面孔，它的另一副面孔——野蛮与暴力，早已成为隐性面孔，被作为面具强行戴在那些后发与被迫现代化国家和民族的“脸”上。因此，在中国这样后发现代性且又是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性不仅包含着启蒙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尖锐冲突，而且还表现为正反两个面孔不断地交错与变幻。

正是从晚清开始，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处于“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更是国运飘摇，风雨如晦，内忧外患，制度不立，纲纪废弃。这种情况发展到1898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68页。

②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5页。

年,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898年上半年开始,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威胁;4月严复的译作《天演论》木刻本出版,在随后的维新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废止维新。1900年至1901年,中国面临的局势更加危险,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和行动的刺激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年9月,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在这一系列变局与创局中,晚清人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中国问题”。何谓“中国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均需要重新论证。这种论证是由西方逼出来的”^①。如果从价值理念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价值理念的冲突如何协调、民族性价值意义理念和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在现代世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

质言之,这是一种本雅明所谓的现代性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紧急状态”一向是现代人在现代历史中对存在(Being)的最基本的感知,尤其是在被迫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解决上述“中国问题”的方法只有一种,即“我们必须形成一种与这样的认识相一致的历史观”^②。在我看来,“紧急状态”是包括影响与反应在内的两种状态:一是外部世界的紧急状态,这是由现代性全面生成和普遍扩散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的爆发导致了无法避免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危机;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认识并感知到这种紧张而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精神紧张状态,这不仅是对外部紧张的一种回应,更是一种强化。所以,晚清知识分子一方面在诗文中描绘西方列强的欺凌,用“物竞天择”的公理来强调这种局面的必然性和危机性,强调“富强”、“自强”,刻意制造一种危机意识,这是在民族存亡之交对现代性“紧急状况”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5页。

② Walter Benjming: *Illumination,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p.257.

所作出的积极反应。与此相应的是,启蒙现代性在中国,表现为现代化的追求,正如晚清以来人们普遍认识到的,“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古老社会唯一可走并正在走的道路”^①。因此,实现启蒙现代性所要求的发展与进步,仍然是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要求下的目标,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启蒙现代性,而是要如何实现启蒙现代性。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意识到这种对富强的追求,将以传统道德、文化的全面丧失为代价,必然要告别以往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态,必然要面对强调富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就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情况而言,主要是启蒙现代性展开的“过程”。可以说,时至今日,我们仍处在这个过程中,质言之,“四个现代化”以及“发展才是硬道理”甚至所谓“西部大开发”等追求,都是追求发展与进步的启蒙现代性的体现。但是,如何在这样的追求中,既努力展开这个宏伟“计划”,又有效避免道德沦丧、生态危机、资源浪费、物质主义等,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只有面对这个问题,并尽量调适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符合现代性悖论的内在机制,才是真正把握住了现代性的悖论,真正了解了现代性的奥秘。在现实中,“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似乎是对现代性悖论的一种调适,但这种调适与理想状态的距离仍然很远。时至今日,现代性正题与反题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结束,现代性没有终结。但也正是这种持续紧张的结构赋予它一种生存的张力,使现代性在自身的二元对立中呈现为没有“终结”的、无法统一的动态过程。

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与古典文论有扬弃的关系,正如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在文学理论中,探讨现代性问题,自然不能把它与科学、人道、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及其历史精神、整体指向等同起来,但是又不能与之分离开来。文学理论要求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从合乎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①

质言之,在通常意义上,现代性就意味着一种现代转换,在外部它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在内部又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可见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化,一方面是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回应,是对现代化过程的参与;另一方面又是对社会现代化的一种质疑和反思。从文学理论角度来切入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细致的话语分析,不仅是清理中国现代性文论思想的发生学需要,而且也可以为我们深入文学理论内部分析其构成因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提供一个独特的契机。因此,所谓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是指传统文论在西方现代文化、文学思潮影响下,逐渐走出封闭体系,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为变革资源的一种转化,即由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的转化。这次转型意味着文学观念及其形式的全面转化。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既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机中的强制性选择,同时也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迫到主动的选择。在这种转化中,现代文艺学初步萌生、成形。至于其后它变化、发展的历史,则要向之后的“五四”甚至整个 20 世纪文学理论追问。

但是,从现代性角度研究文论的转型,常常会把历史的发展与逻辑的推理混为一谈,陷入一种潜在的思维模式,以为历史和

^①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 年第 2 期。